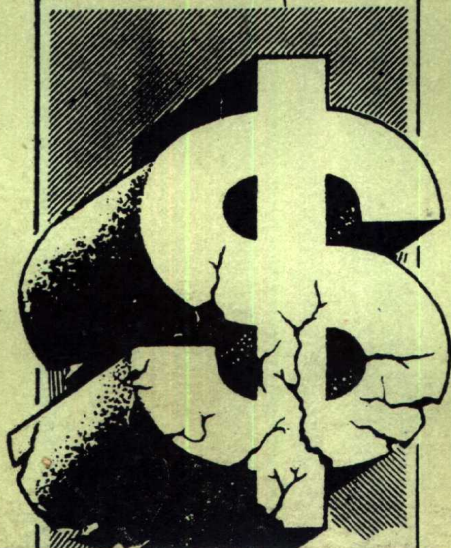


經濟理論的革命家

凱因斯



當代學術
巨擘大系

● 經濟學 ●

經濟理論的革命家——凱因斯

作者：謝

德

宗

發行人：吳

東

昇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者：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臺北市南京東路二段一二三號五樓

電話：五二二二八八二 五二二四三〇八

郵政劃撥：臺北郵政五五四五六六

內文排印：四維印刷廠有限公司

地址：板橋市長江路二段三一〇號

裝訂：正字裝訂所

紙張供應：永豐餘造紙股份有限公司（特製畫刊紙）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二五二三號

初版日期：中華民國七十一年十一月一日

●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調換。

S8705/8 (中1-9/51)

經濟理論的革命家 凱因斯

(J. M. Keynes)

BG000220

當代學術巨擘大系

(依姓氏筆劃序列)

編撰委員：

方文碩 石磊 朱建民 朱法源 朱雲漢 朱雲鵬

李日章 余光弘 宋光宇 呂亞力 阮昌銳 柯永河

孟玄 林邦傑 林炳文 徐光炎 唐光華 高承恕

胡台麗 胡決陽 俞筱鈞 徐火炎 陳秉璋 陳素甜

高俊一 徐啓智 陳木在 張世賢 許勝雄 陳寬政

張恭啓 許添財 張立雲 陳國祥 賀建國 游盈隆

黃瑞祺 黃榮村 陳榮波 彭嘉猷 張嘉敏 黃維憲

陳衛平 陳曉林 黃應貴 彭百顯 賀建國 楊樹同

彭錦鵬 彭懷恩 齊力 詹火生 楊樹同 葉啓政

楊麗瑛 莊耀嘉 廖克玲 葉明華 葉春榮 謝世宗

鄧世安 鄭泰安 鄭慧玲 蔡文輝 蔡式淵 謝世宗

蔣斌 謝復生 謝德宗 瞿海源 關紹箕 謝世宗

主編：

李亦園 (人類學) 林鍾雄 (經濟學)

胡佛 (政治學) 楊國樞 (心理學)

葉啓政 (社會學) 郭博文 (哲學)

執行編輯：宋光宇 (人類學) 吳心健 (哲學)

彭懷恩 (政治學) 黃曜莉 (心理學)

楊志弘 (社會學) 陳忠義 (經濟學)

總企劃：彭懷恩

企劃：朱純蕙 朱俊哲 宋光定 李牧 張覺明

美術編輯：張政文

作者簡介

謝德宗，高雄市人，民國四十三年十月四日生。民國六十五年六月畢業於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系，六十八年六月畢業於該校經濟學研究所碩士班，現任該校經濟學研究所博士班肄業。同時，自大學畢業後即留在經濟學系擔任助教，現職為經濟學系講師，講授「貨幣理論」及「經濟學」。

重要論著有：一、「預算限制與財政政策有效性之研究」（一九七九），二、「小型開放經濟與失衡體系穩定性之探討」（一九八一），三、「最適貨幣政策指標之抉擇」（一九八一），四、「貨幣需求理論發展之檢討」（一九八二），五、「固定匯率制度下預算赤字融通之總體效果」（一九八二）。

目 錄

總序	一
經濟學系列序言	五
自序	一五
第一章 凱因斯的時代	一九
第二章 凱因斯的生平	四五
第三章 凱因斯的貨幣理論思想	六五
第四章 曠世巨著「一般理論」的貢獻	九九
第五章 對國際經濟關係的貢獻	一六一

第六章	凱因斯的社會哲學思想	一九九
第七章	結論	二三三
	年譜簡表	二三九
	著作目錄	二四五
	參考書目	二九四
	中英名詞對照表	三〇二

總序

在過去的三十年間，中華民國雖努力從事現代化的發展，但在過程中也相當顯示一種高度的「不均衡發展模式」。一方面我們創造了開發中國家經濟發展的奇蹟，另一方面卻保有某些傳統社會的觀念及行為模式。而造成物質與社會心理層面兩者不齊步調的現象，其中有待探討的原因固多，但我們認為一項重要的主因是我們社會對於人文及社會科學重視的程度，遠不及對自然科學的重視。在高唱「科技報國」、「經濟為尚」的社會中，自然科學成為「顯學」；相形之下，人文及社會科學並不被視為當務之急，在這種不均衡發展的知識結構下，怎能建構均衡發展的現代化國家呢？

我國對現代化的策動，常輕視或忽視人文及社會思想，這可回溯到清末的西化運動。因為中國現代化的動力並非出自自發，而是受到體系外強大外力挑戰下的反應；爲了生存，必當自強，「自強以練兵爲要，練兵又以製器爲先」。在這種追求船堅礮利的觀念主導下，所引介的西學，自然是工藝之學，是所謂的「兵工文化」，殊少人正視到西方科技原是植根在社會及文化的基層結構之上的。就是因爲這種發展取向的偏差，使自強運動的成效遠不及近鄰日本的明治維新。當滿清警悟到「中國眞憂之所在，乃政令之不修，風俗之頹靡」時，清朝已日薄崦嵫，無力抗拒列強勢力的入侵及革命的怒潮了。

造成我們祇重視西方的科技，而輕視西方基層文化的原因，主要出在我們對整體西方文化欠缺深入的了解。了解的缺乏及貧瘠，都會導使我們做無謂的反應，而影響到我國現代化建設的方向與功效。對這一過程的觀察，我們祇願引一位平實的近代史學者郭廷以教授的話加以印證。他說：「中國近代西方文化由輸入到認識：所得的功効則有限，近代化的進度不夠迅速，因之在民族文化競賽途中，我們落後了，其主要因是我們不能適應新的環境，我們的近代化不夠徹底，其所以不夠徹底，是努力不夠，其所以努力不夠，是了解不深，認識不足，率直的講，即是對近

代西方文化了解不深，認識不足，西方文化的內容也就所剩無幾了，如何充分的了解認識西方文化，如何順利的輸入西方文化，如何圓滿達成中國的近代化，這是值得而且是必須反省的問題，亦是必須努力的方向。」

的確，從民國以來，縱使經過高唱「民主」與「科學」的五四運動，中國對西方的認識，仍多於物質層面，而對歐美先進國家的文化則缺乏深入的了解。不寧惟是，歐美社會科學的進展，自本世紀來，可說一日千里。在歷經行為科學的革命後，社會科學的知識實愈趨系統化、經驗化，無論對人類行為，以及文化、政治、經濟、法律、社會諸現象，皆有更周延、更深刻、更精細的探究。然而這些知識上的成就就在我們中國人的社會，一直缺乏整體性的引介，讓我們一同分享屬於全人類的知識菁華，這毋寧是一件令人遺憾的事。

我們堅決地認為：文化是屬於人類全體的，不應有東西涇渭分明的對峙。每個民族的創造與發明，雖是克服各自環境挑戰的成果，但這些成果不應祇是個別社羣的專利，而應供全人類所共享。因此，站在中國人的立場，融合歐美文化的成就，以促進自我文化的發展，並進而對全人類的社會有所貢獻，這是我們的權利，也是我們的責任。基於這一體認，我們認為讓中國人不受制於語文的障礙，不受阻於文

化的隔閡，順利地吸取當代歐美學術思想的結晶，是這一代受過現代教育的中國知識分子不容推卸的大責任。

「當代學術巨擘大系」的編纂，即是邁向整體文化融合的一小步。這套集合海內外百餘位人文、社會學者所共同編著的系列著作，主要的目的是將本世紀歐美最具影響力的學術思想與理論，透過深入淺出的中國文字，介紹給中國的讀者，使有意研讀的人，都能很快地掌握住當代人文及社會科學思想的精髓，擴大對社會現象思考的廣角與深度。

這套叢書由計劃到撰寫，由完稿到付梓，前後歷時近兩年，參與者莫不以兢兢業業的精神，貫注於這項思想交流的工作中。我們期望透過這一小小的努力，能激起國人更多的努力；一面加深對西方文化的探索與了解，一面對我國現代化的建設，在文化的根本處有所助成。

經濟學系列序言

林鐘雄

依照流行的說法，經濟學在不久之前，才度其兩百週年的生日。在其成長與發展過程中，至少有過三次重大的學理或思想的轉變。

一七七六年，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Adam Smith)刊行其「國富論」(*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把當時已經存在的對經濟現象的解釋及經濟政策主張，加上他自己的見解，整理出一套自成體系的學問，強調市場機能的作用，對先前存在的重商主義體系(*the mercantile system*)提出嚴苛的批評，稱為亞當斯密革命(*the Smithian revolution*)，大部分經濟學家並以「國富論」為第一本有體系的經濟學著作，而尊稱亞當斯

密爲經濟學之父。

一八七一年，英國經濟學家耶達斯 (William Stanley Jevons) 刊行其「政治經濟理論」(*the Theory of Political Economy*)，揭發邊際效用原理，對亞當斯密、李加圖 (David Ricardo)、小彌爾 (John Stuart Mill) 所辛勤耕耘的正統價值學說，展開無情的攻擊，建立一套新的分析方法，稱爲耶達斯革命 (*the Jevonian revolution*)。

一九三六年，英國經濟學家凱因斯 (John Maynard Keynes) 刊行「就業、利息與貨幣的一般理論」(*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對於認爲市場機能足以使總體經濟體系完成自我調整過程的古典理論提出質疑，而建立一套總體經濟分析方法，倡導政府對經濟活動進行適當的干預，稱爲「凱因斯革命」(*the Keynesian revolution*)。

這是正統經濟理論的三個重要轉變，每一次的重大轉變，都建立一個新正統經濟學，而這些正統經濟學都具有幾個共同的特色：第一，這些正統經濟學都藉批評舊正統經濟學的缺失而建立，且其主要思想都可追溯至較早期經濟學家的著作，卻常強調其經濟體系的原創性。例如，亞當斯密革命係對盛行於十七、八世紀的重商

主義體系提出批評而建立，其思想有一部分源自早期經濟學家的著作，但「國富論」中很少提及早期那些經濟學家的名字。小彌爾甚至聲稱在亞當斯密之前沒有所謂經濟思想。再如，凱因斯在其「就業、利息與貨幣的一般理論」中，雖提及馬爾薩斯(Thomas Robert Malthus)及重商主義，但未申論與其經濟理論的關係，從而使不少凱因斯的追隨者認為，凱因斯建立了一套全新的總體經濟分析體系。第二，這些正統經濟學的主要追隨者，或集大成者都宣稱，經濟學體系的推論及其結論有如自然科學一樣確定，或接近完美的程度。例如，一八四八年，小彌爾聲稱古典學派的價值法則的理論已告完成，無須後世經濟學家再費神研究。再如，一八九〇年，馬夏爾(Afred Marshall)把先前慣用的「政治經濟學」(political economy)改稱為「經濟學」(economics)，以示經濟學有如自然科學那樣是一門具嚴謹體系的科學。又如，凱因斯的追隨者將其理論數量化，並據以建立計量經濟模型，進而認為依這些模型的操演及所提出的政策建議，經濟學家直可支配經濟活動的趨向。第三，在這些正統經濟學相繼作為經濟學的主流，支配各個時期的主要經濟思潮的兩百年間，異議者(dissent)或異端(heterodox)都一直存在著，且其聲勢也不小。例如，在亞當斯密、李加圖、小彌爾的經濟學正統盛行時期，社會主義者

(socialists) 及演進主義者 (evolutionists) 對經濟現象提出不同的解釋。再如，自耶達斯以後邊際效用分析盛行期間，歷史學派 (historical school) 及制度學派 (institutional school)，對經濟學的研究方法、研究對象、乃至於結論都提出不同的看法。又如，自凱因斯革命以後，不但是凱因斯的後繼者分爲幾個陣營互爭正統，且有所謂的激進經濟學 (radical economics)、新左派經濟學 (economics of new left)、新制度學派、新奧地利學派 (new Austrian school) 等異端的存在，甚至更有所謂貨幣學派的反革命 (monetary counter-revolution)、劍橋新李加圖學派 (Cambridge Neo-Ricardian school) 等經濟理論的出現。令人眼花撩亂，不知經濟學的聖地究在何處。

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人類的經濟活動，而經濟活動不但是週而復始秩序井然的狀態，而且更不是年年順利依序保持著成長的趨向，隨著經濟環境的變遷，經濟問題的種類及其性質總會發生變化，當時的正統經濟學說，總是被當作塑造處理經濟問題之經濟政策的依據。若所提出的政策措施得以化解經濟問題，正統經濟學始能保住其地位；若經濟問題未能順利解決，則正統經濟學的地位便會動搖，進而且被新正統經濟學所取代。

一七七六年「國富論」刊行時，英國處於由農商經濟轉變為工業經濟的轉捩點，其後百年間，雖然李加圖、小彌爾等經濟學家，根據產業革命後的新經濟環境而加以補充修正，但對產業革命後的價值決定與分配原理都漸失去解說能力，故一八七六年，在倫敦慶祝「國富論」一百週年時，耶達斯革命即已漸被接受，亞當斯密體系漸趨沒落。一九二六年，在芝加哥慶祝一百五十週年時，戰後的就業問題仍未有效解決，且不久就發生了所謂世界經濟大恐慌，建立總體經濟模型，提出解決失業問題之對策的凱因斯革命也成為經濟學的主流。一九七六年，在亞當斯密生前任教的格拉斯哥大學（Glasgow University）慶祝兩百週年時，全世界正飽受能源危機所帶來的停滯膨脹（stagflation）的苦惱，許多經濟學家都直言經濟學正處於一個新危機之中，甚至都期待著經濟學新革命的來臨。可是，新經濟學又將是何等模樣呢？

經濟學與自然科學最大的不同點是：在科學革命發生之後，自然科學幾乎得捨棄舊理論的全部，經濟學則不然。一八九〇年，劍橋學派創始者馬夏爾在其「經濟學原理」第一版序就曾指出：「當代有些最好的著作，初看起來似乎與以前學者的著作處於敵對地位；但是，當這些著作有時間歸入它的適當的地位時，它的粗糙的

邊鋒被銷蝕掉了，便被發現它並沒有在這個科學的發展過程中，真正的破壞了繼續性。新學說補充了舊學說，擴大、發展和有時候改正了它們，同時由於對著重點的重加調整，時常給予了它們以一種不同的風格；但很少推翻它們。」這些話乃是「自然不能飛躍」(Natura non facit saltum)所表現的「持續原理」(principle of continuity)特別適用於經濟學的最好註腳。

在經濟思想發展上，「自然不能飛躍」至少表現兩項意義：第一，劃時代的經濟學著作，並非全都無中生有，有時是若干舊思想的重新組合而展現新面貌；有時是由某些舊思想，應用於新經濟環境引申發展而成。總之，早先的舊正統並未被排除，而係以各種方式被融合在新經濟學之內。第二，在經濟學危機發生後，經濟學家對其先哲的遺產都會重新重視，重新研究探討，有時甚至會發現意想不到的寶藏，甚至藉此而建立新經濟學。

現在，經濟學又發生了危機，正統理論對目前的經濟問題，提不出有效的解決辦法。除了更認真檢討正統經濟理論的缺失外，經濟學家們又掀起檢視其先哲著作的潮流，希望在故紙堆中覓找新靈感。

經濟學先哲們的著作中，固然可能藏有解開目前經濟學危機的觀念之鑰，但是